

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及其伦理支撑

王引兰

[摘要] 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不断应对时代难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特殊力量,有着独特的历史传承和历史积淀,并以特殊的样态或姿态呈现于世,也必将以坚实的力量支撑和引领中国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之产生新使命、新矛盾、新挑战,特别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新问题呼唤新精神。中国精神日益增添着新的时代内涵包括根因内涵、本真内涵、标识内涵、灵魂内涵、目标内涵和动力内涵等。时代使命越艰巨,精神构筑的需要就越迫切。应对时代呼唤,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就需要把握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探寻其背后的伦理支撑。

[关键词] 中国精神;时代内涵;伦理支撑;新时代

[作者简介] 王引兰,忻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筹)教授,太原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

DOI:10.15995/j.cnki.llxyj.2021.03.014

人类往往是当其面临的挑战加剧时,就越需要精神力量来支撑和引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日益艰巨,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呼唤着中国精神的更好构筑与升华。中国精神从形式上看,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样态或姿态;从内容上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与淬炼;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人民在不断应对各种时代难题挑战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精神结晶;从历史渊源上看,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巨大精神力量;从功能作用上说,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和推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不断向前的精神力量。中国精神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自觉铸就的,是在不断应对挑战中淬炼出来的,也是在不断解决问题、战胜困难中构筑起来的。实践创新每前进一步,精神的构筑就需要跟进一步。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已全面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到了“滚石上山”的时候,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应对突发事件,以及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等难题和挑战中,需要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而要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则需要厘清其时代需要(呼唤)、时代内涵,探寻其背后的伦理支撑。

一、时代呼唤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一种精神力量往往是人们自觉主动应对时代挑战和不断解决时代难题的实践过程中凝聚或构筑而成的,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它是人们自觉活动的产物,而非自然而然形成的。

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个复杂的系统。它与社会生活实践密不可分,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受社会实践所决定,又相对独立于社会生活实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的基础。”^{[1](P9)}无疑,当下中国社会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必然决定中国精神的本质和形成。然而由于当今时代社会生活实践、经济生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决定着中国精神内涵及其构筑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挑战与应对”(17JD710086);忻州市软科学项目“忻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20190703-2)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和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精神的变化是受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因而,积极向善向上的变化是主流,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崇尚个性独立和自由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公正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科学观念、竞争观念等现代观念得到了极大发展,主人翁精神得到了普遍提升。”^[2]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辩证地看,人们精神生活层面在向上向好的同时也有妄自菲薄、消解主流价值、盲目崇尚西方、否定传统、缺乏民族自信等消极的一面。“相应于物质性的瞩目成就和制度性维度的部分共识,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问题重重,争论迭起,逐渐成为现代性问题视域中的突出问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意义失落、精神贬值、价值坍塌、道德失范、理想缺失、虚无侵袭等诸多问题。”^[3]社会的智性、理性和德性水平都有待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突出等,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和质量,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现实的召唤。应对呼唤,梳理问题,剖析原因,以期破解难题,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当今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与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主义以及义利冲突导致人们道德精神的滑落、人伦关系的紧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层面的富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想有能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唯利是图、信任感缺失、人情冷漠、以自我为中心、见利忘义、追求低俗等。人们对市场的过度崇拜,直接形成了物质至上、追求享乐、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等价值取向。人们仅仅看到市场的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市场的盲目性以及资源的浪费等负面效应,过度依赖市场,而看不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如市场竞争中的不当逐利现象,一些商人为了金钱违背伦理道德,甚至越过法律的红线危害社会。每年的“3·15”晚会所揭露的问题都令人触目

惊心,人们不禁感叹“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这种一味地逐利倾向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的诚信价值体系,而且带来了社会的道德危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感,消解着人们奋斗的激情和勇往直前的斗志,迷惑着年轻人前行的方向,迫切呼唤大力塑造中国精神来矫正价值取向,凝聚人心。

第二,人与社会、国家关系上,受多元价值观影响,人们伦理精神的失落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人家国情怀淡薄、社会责任感淡化、追求不受约束的自由等。这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自由主义思想泛起,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文明进步造成负面效应。如一些人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自由”“民主”缺乏科学的辩证的理解,辨不清西方“普世价值”的伪装,不了解自由、民主的实质。在泥沙俱下的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想往往夸大了自由的度,追求不受约束的自由,在实际生活中具化为自私自利、自由散漫,以自我为中心、国家民族意识淡薄,将自我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等。其次是对民主的泛化理解,混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推销西方“宪政民主”。或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民主,把民主当成抽象的民主、一般的民主,而看不到民主的阶级本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最后是多元价值观带来的选择困境,人们变得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加之,网络时代信息的“去中心化”对话语权进行解构,自媒体、社交媒体中,人人都有发言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信息的“核武”化、虚拟化,导致人们容易被网络上一些言论所左右,而有的青年学生则“看待问题很容易走极端,最终沦为‘键盘侠’”^[4],等等。在一些人看来,神圣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变得微不足道!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规范来规约和引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群体意识和精神成长的土壤,但精神作为能动的力量却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现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精神正是引导良好社会伦理的指针。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在重生产发展轻环境保护的理念影响下,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缺失,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环境破坏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下降等。生态伦理意识是生态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伦理观是人类对待生态环境所特有的一种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它关注的是人类自身和对周围

生态环境的认知、态度以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理想的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然而,由于人们重生产发展轻环境保护的理念导致生态伦理意识的缺失,以至将自然界作为征服的对象,片面追求工业化,追求经济利益,带来了大量的生态创伤,自然环境被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空气质量下降、水污染严重,以及异常气候灾变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问题。因而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生态伦理意识,构筑强大的精神支柱,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实现与诸多问题的存在,迫切呼唤着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引领现实发展。拨开迷雾需要清晰的判断,清晰的判断基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个体的精神只有汇聚成群体的精神才更有力量。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解决前进征途中的重重难题。反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5]。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个方略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显著优势上强调了中国精神的作用,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6](P2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建议包含了“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7](P9-10)}等。这从指导思想的高度和角度引领和指导着中国精神的构建。中国精神自身的发展逻辑就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应对时代问题而不断凝结、淬炼和升华,那么厘清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

精神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是指与物质相对的,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

人们对物质世界和实践活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其社会存在的反映,但人们的精神也改变着物质世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2)}“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P525)}狭义上的精神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灵魂和核心,是指在心理、意识、观念等基础上形成的更为本质的东西,是人的气质、气节、灵魂、品格、境界等多种因素的集合体。中国精神主要是指狭义上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思想信仰、品格修养、道德理念、人生态度和气概情怀等的综合体。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特有的精神气质、精神气概和精神气派。其内涵既具有共时性,也具有历时性。共时性的内涵是历史发展的血脉,它是各个时代共有的某种精神特质;历时性的内涵是现代精神的精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内涵的概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0](P40)},彰显了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的特征。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国精神的共时性,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共同的内涵;时代精神体现了中国精神的历时性内涵,即在新时代有不同于以往特有的内涵。深刻地把握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利于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既是历史的民族精神的传承,特别是中国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和新时代改革开放精神的凝结,也是当今时代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发展的实质反映、经验总结和精神升华。也就是说,中国精神既有纵向维度的民族精神内涵,也包含横向维度的时代属性,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内涵相互聚合、有机统一,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整体样态。

第一,根因内涵。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首要内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魂基因。中国精神首先是以历史发展的血脉为根因性内涵。它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从纵向维度审视,是中国精神的历时态内涵,它既包括历史传承下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更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形成的革命精神与以艰苦奋斗

为特征的建设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铸就了中国精神丰富的历史内涵,蕴化生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基本内涵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孝亲敬老、和合重义”的团结精神,“顾全大局、宽容奉献”的整体主义精神,以及“革故鼎新”精神等。如,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很早就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构成了当代改革创新精神的历史渊源。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11]。吴潜涛教授“将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整体”^[12]。这些内涵,凝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淀在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也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特有禀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中国精神发展嬗变为以革命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精神为主要内涵的新样态。革命精神形成于革命时期,但包含着跨时空的普遍意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革命不仅仅是指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社会革命,还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P527)}的一切行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P500)}。只要有社会变革的革命实践活动,革命精神的存在、衍生和发展就是必然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13](P69-70)},因此,他告诫全党同志“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13](P70)}，“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3](P71)}。革命精神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精神发展的内在需求。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主要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既有革命精神,也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如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中,既包含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还包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14]等内涵。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是民族血脉的传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接续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同时,又成为我们今天正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渊源。

第二,本真内涵。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本真内涵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所谓本真内涵,即是由时代实践直接决定的、与时代实践密切适应的精神内涵。本真内涵是横向维度上的中国精神。实践是精神生长、滋养的源泉,精神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根本上是由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决定的。改革开放,这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15]。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精神在承继传统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在反映时代特性、实践本性的基础上升华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手段。但改革绝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应对挑战、主动解决矛盾的结果,反映在精神生活层面就是改革精神、创新精神。人们的精神越是自觉,越是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更加深刻,改革的深度广度就会越大,改革的成效也才会越大;越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挑战,从事改革,创新就越有可能,创新的成果也才会越大。“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理念等构成了创新精神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无一不体现创新精神。吴潜涛教授“将时代精神概括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甘于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整体”^[12]。这种精神是冲破那些不合时宜、僵化保守、因循守旧观念的有力武器,因而焕发出人们前所未有的精神活力,推

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大踏步发展和辉煌成就的取得。

第三,标识内涵。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标识内涵是与改革创新精神紧密相联的改革开放精神。所谓标识,是表明某事物特征的记号或形象系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标识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15]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产生、形成和铸就的直接土壤。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15]。开放,是系统的生命,相反,封闭意味着系统的消亡。改革与开放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改革是开放的条件,开放是改革的动力;开放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改革也是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社会向前发展。对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有着特别的含义,它是时代转折的标志,也是时代变迁的标志。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5]。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6](P39)}。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开放越来越显得重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3](P194)}不断发展着的改革开放实践,铸就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开放的胸怀、开放的眼光,包容、共赢、合作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最鲜明标识”,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方案的精神动力。

第四,灵魂内涵。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灵魂内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逐渐发生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仅仅体现在对物质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和谐等追求上,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诉求,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权利、秩序的维护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向上、

高雅情趣、崇高境界等的追求上。相应地,作为群体意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凝练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3](P33)}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是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体现着我们“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6](P93)}。价值观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处理个人与他人、职业、群体、国家、社会、自然等关系上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态度。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0](P169)}。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体现了人们的基本素养和精神品质。发挥核心价值观对社会生活的引领作用,必须培育和践行之,使之成为全民行动,并使之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就必然会成为构筑中国精神的必要环节。

第五,目标内涵。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目标内涵是“伟大梦想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中国精神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新的概括,他指出,这一“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包含“四种伟大精神”,亦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与“伟大梦想精神”^[17]。这是梦想精神的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0](P36)}。“伟大梦想精神”支撑着、推动着中华民族朝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0](P35-36)},但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此三者是实现伟大梦想最迫切的精神动力。

第六,动力内涵。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在精神动力的层面上进一步淬炼

出了“斗争精神”“抗疫精神”“北斗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新内涵。斗争精神既是一种革命精神,也是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奋斗精神和担当精神,是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精神,还是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应对挑战,在变局中开新局,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保持和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离不开斗争精神。“抗疫精神”也是一种斗争精神,是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在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18]。生动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还形成了新时代的“北斗精神”,其主要内涵是“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19]。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锻造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20]。这些时代精神既是对时代难题挑战的回应,也是对伟大民族精神的赓续与传承,既承继了民族基因,又凝结了新的价值追求;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又在思想理论、精神境界上有新的创新、新的提升。这些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进、追逐梦想的不竭动力。

总之,从纵向维度审视,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从横向维度来考察,中国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本真内涵)、改革开放精神的标识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内涵,以及“伟大梦想精神”的目标内涵和伟大“斗争精神”“抗疫精神”“北斗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动力内涵的有机统一。

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将逐渐演化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表现为当代中国人民的最主要精神样态,进而成为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挑战的精神武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持久与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了中国精神,特别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蓄积了中国精神;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丰富发展了中国精神。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中,中国精神不断蓄积、锻造和跃迁。当然,中国精神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发展的。它需要人们在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和困难中自觉主动地蓄积、锻造和更好地构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21](P47-48)]。中国精神的构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探寻其背后的伦理支撑。

三、中国精神构筑的伦理支撑

精神、意识的主体是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9](P533)]。人类的社会关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精神的等多层复杂性。而伦理的关系是经济的、政治的关系与精神的关系之纽带和桥梁。马克思称之为“实践的精神”。构筑中国精神需要从筑牢基础做起。中国精神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而社会的伦理关系根植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实践。因此,人们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中国精神构筑的直接支撑。

第一,以人为本构建人伦关系的良善道德根基。人伦关系受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决定,受精神文化引领,同时它也成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基础和根本内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平等、自由、民主、诚信、友善等。但由于如前所述的问题及原因使得人伦关系的良善道德基础的构筑成为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道德建设任务。我们需要克服市场经济以物为本带来的弊端,构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伦关系。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还是一种伦理要求。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良善道德为规范,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以及尊重人的合法权利、能力差异等。所谓良善道德,即以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0](P168)]“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

上》),“人无信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良善与否关键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性。人伦关系不单纯是自然形成的,更主要的是由人们积极构建的。人们基于社会道德要求而立德修身,培育诚信、友善的个人品德,建构孝老爱亲的和谐家庭美德,进而建构起与他人的理性平和的友善关系,再延伸到处理人与物、人与事、物质与精神等,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民主平等,爱国奉献。人们遵循的逻辑是在道德上坚守做人的底线,人伦关系往往诚信可靠,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义重于利”“义以为上”。因此,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人伦关系良善道德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市场逐利带来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进而形成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为中国精神的构筑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以家国情怀为纽带构建人与社会、国家的责任伦理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本性决定了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对大多数劳动人民而言,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如就近世而言,在资本统治的社会,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民主却被他们说成是“普世价值”,用来迷惑大众,且到处输出其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带来的却是被输入国和地区的动荡和不安。即便是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也在上演着资本至上的逻辑。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国家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与此相适应,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爱国、诚信、忠诚、尽责等道德合乎逻辑地形成。当然,由于精神等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吸收外来的复杂性,因此疏离感甚至背离也是可能有的。正如李建华教授指出的,“现代社会造成了个体、群体、社会三位一体关系中的伦理的拆解与断裂,这种断裂需要通过强化伦理连接的方式来解决”^[22]。伦理建设的任务在于建构这种“伦理连接方式”,引导人们科学理性地把握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建构以家国情怀为纽带的责任伦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培养个体对国家、社会的情怀和责任意识,凝聚人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第三,以绿色发展为核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基础。生态环境问题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复杂的,受到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全球生态面临“临界点的大变革”,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最重要的伦理指归。恩格斯说,“和谐”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9](P63)}。树立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追求热爱自然情怀、绿色发展理念、科学治理精神、人与自然和谐是最起码的伦理要求,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期盼。和谐才能共生,和谐才能化解生存危机,才有生态安全。和谐生态伦理要求人们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科学治理环境、文明修复生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3](P361)}。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体现着人们超越生存需求的精神追求,即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人们实现了温饱之后的热切期盼。中国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形成了自身独到的精神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和原则;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两山论”,认为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P361)}，“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3](P362)},等等,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引导人们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清洁美丽世界。在中国社会,人们逐渐形成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生产生活理念,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深深影响着社会伦理规范和制度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态文明观逐渐深入人心,并将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不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而且为全球抗疫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体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各国只有携手并进、守望相助才能共渡难关。事实也在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对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维

护经济发展、拯救人的生命与物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做法及其彰显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是正确的,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伦理观念是凝聚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

人们的行为是靠精神来规约的,伦理是最直接的规范。人们的行为也是靠精神引导的,伦理是坚实的基础和支撑。中国精神的构建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宇文利.精神世界的进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活变迁的主基调[EB/OL].光明网.(2018-12-13)[2021-03-27].http://guancha.gmw.cn/2018-12/13/content_32164069.htm.

[3]韩庆祥.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人的精神世界重建[J].求索,2019,(1).

[4]戴苏越,杨光斌:“为什么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普世价值”,思政课如何回答这个问题[EB/OL].观察者网.(2019-03-25)[2021-03-27].https://www.guancha.cn/YangGuangBin/2019_03_25_494884.shtml.

[5]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1]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党的文献,2006,(1).

[12]沈壮海.中国精神的“根”与“脉”——评《中国精神教育读本》[N].光明日报,2015-01-06(10).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24(2).

[1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

[16]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17]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N].人民日报,2018-03-21(1).

[18]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N].人民日报,2020-09-09(3).

[19]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对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的贺电[EB/OL].(2020-07-31)[2021-03-27].http://www.gov.cn/xinwen/2020-07/31/content_5531679.htm.

[20]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21-02-26(1).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2]李建华,刘刚.道德适应:新型伦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0,(7).

(责任编辑:心 广)